

自制的海图

The Self-made Chart

林贤治 著



社

林 贤 治

自制的海图

The Self-made Chart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制的海图/林贤治著.—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5
ISBN 7-5347-2466-X

I.自… II.林… III.知识分子—研究—中国
IV.D66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9995 号

责任编辑/佳言

责任校对/张静燕 王森

书籍设计/张胜

出版/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农业路73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大象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0371—5726194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次/2000年6月第1版 2000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

字数/210千字

印数/1—5325册

定价/18.00元

题 记

历史研究是一件奢侈的事。人生在世，倘若有余暇回首往事，甚或可能如实记下个人所历的“沧桑”，已不失为一种幸福了，遑论天下呢？

把社会事件、人物、问题，制作成一门职业、学问、教程，并名之为“历史”者，大约来源于两类人。首先是权力者，利用史官记录、编造、删除、涂改，把材料意识形态化。其次是学者，他们做的是学术工作。材料原本丛生于生活之中，散发着生命的各种气息；他们一旦将材料收集到手，为了永久保存，总是设法把气息——有机体最重要的特征——给除掉。所

2 题记

以，说学者大抵由史官蜕化而来，也不算诬枉。通过修史，他们把时间垄断起来了，目的是使之成为集体的强制性记忆。当谈及个人历史时，难免要牵涉社会历史，这样实际上也就无法避免历史学的霸权话语的干预。历史是不同于历史学的。而历史学这东西，由来太迁就公共性、既存性、永恒性，这是为它的成因所决定的，因此，有必要使它回到个人性上面来，由生存个体的感知，显示历史的时间效能。历史不是封闭的，而是向未来作着不断的延伸和衍生。如果历史学也算得是一门科学，那么，它必须体现历史自身的这种人文性和开放性。历史是一个范围，动荡无际，并不存在固定的范式，本当可以自由猜想和言说的。

本书收入年内写作的两篇长文。一篇关于“五四”，其实是从那里发端而对近一百年历史——主要是思想文化史——所做的一个概观；另一篇，则是关于本世纪后五十年中国文学的一个侧面——为出版界所接受的散文写作——的一点窥测。在时间上，两者有一种连续性。这种历史连续性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背景。许多思想，无论化装或不化装，就在这一背景上化出化入，使我看得惊奇。老实说，虽然所写是政治、社会革命、文化运动、文学现象种种，是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迁变，在我，重要的是据此表达个人的实际感受，我的对于自己和他人的哀悯、不满与不平。当穷尽许多时间，进入陌生的历史之后，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得确切地知道：关于我自己，到底身在何方？

譬如航海。直到离开海岸，才发觉自己没带海图。当然，即使此前握有别人绘制的海图，只要意识到出航，我也未必使用的。原因很简单，如果沿袭长期以来从不变易的航

线，即使自以为独立驾驶，也无异于别人船上的一名乘客。然而，致命的是由于山民出身，于大海简直一无所知。所谓航海，常常进退失据，此举无非表明私下的一种意愿罢了。在没有方向中行驶，尤其在礁区，其结局，一半是命运，另一半才是探寻。

可以肯定的是，我大概无法抵达彼岸。我将长久地留在漂移和冲击之中。给本书取名“自制的海图”，说得太夸大了。事实上，海图是没有的，只能说是一份日常思考的记录，就算是“航海日志”之类罢。这种东西，于自己是一份纪念，于别人似乎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航海毕竟是个人的事情。

1999.12.26

目 录

1 题记

上编 五四之魂

3 重新发现历史

8 “五四”：知识分子的自治运动

28 “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49 价值领域中的诸神斗争

75 思想：地面状态与地下状态

101 后“文革”：一个倒影

121 知识分子与精神

下编 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

129 一、根

146 二、干

171 三、枝叶（上）

210 四、枝叶（中）

238 五、枝叶（下）

279 六、其他

上 编

五四之魂

起来！让我们把精神从这些妥协、这些可耻的联盟以及这些变相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精神不是任何人的仆从。我们才是精神的仆从。我们没有别的主人。我们生存着是为了传播它的光明，捍卫它的光明，把人类一切迷途的人们集合在它周围。

——罗曼·罗兰等《精神独立宣言》

没有暴风雨，将会是一个多么污浊的天空！

——齐美尔



重新发现历史

密芝勒在《人民》的开篇写道：“谁把思想局限于现在，谁就不能了解当今的现实。”

伟大的时代是具有历史感的。惟有平庸的时代，人们才会只顾眼前的事务，像猪狗一样，为有限的施予感到幸福，从来不曾想到把目光从食槽旁边移开，投向栅栏之外那延绵无尽的森林和原野。如果没有历史，我们在现实中将找不到判断事物的标准，以及通往未来的坐标；我们无法走动，更不会想到飞翔。如果没有历史，我们既意识不到自身的能力，也意识不到自身的局限。是历史照亮了我们，驱赶

着，鼓舞着我们；如果没有历史，我们的全部生活将失去意义。历史以其固有的“相对论”原理，通过现存，从另一维度连接人类的未来。

然而，历史的轮廓未必是清晰的。有时候，它显得异常神秘，恍如海市蜃楼；有时候很曲折，天梯石栈，云翳重重；有时候则为大手所倾覆，全然不见形迹，有如火山灰下深埋的庞贝城。许许多多的人物、事件、关键性时刻，彼此错综的关系，都期待着我们用实证的方法逐一加以钩稽。当历史事实变得相当彰显的时候，我们竟发现：它仍然无法识辨。尤其难以置信的是，愈是明白的事物，往往愈见隐晦。历史是可分解的。它的任何局部，都存在着两大元素：现象和精神。现象是外在的、孤离的，纯粹属于过去的；精神则居于深部，具有历史的主体性、主动性，呈弥漫、流动的状态，而富于凝聚力，所以能够赋予诸多现象以整合的能力，并使之复活，带上各自的形象和意义，走出封闭的时间。

历史是精神的历史，是精神对于人类集体记忆的再发现。由于精神的介入，历史才是真正可理解的。精神的指向、质量、深入的程度不同，我们回顾时所目及的一切便有了不同的价值。可以肯定，那些不断地为人们提及的历史断片，都有着相当丰富的精神含量，闪耀着启示之光。即以“文革”结束以后的二十年为例。“焚书坑儒”成为利用率最高的典故，就因为事关知识和知识分子；政治文化专制主义并不局限于秦王朝，没有随同祖龙之死而进入骊山墓。近世的“太平天国”，作为几千年中国农民造反的大结尾，其令人触目惊心之处在于：鼎盛的“天朝”毁于一旦，并非来自官方敌对势力的打击，而是因为内部特权阶层的存在，大一

统思想、控制欲、享受欲，以及与此相关的激烈的权力斗争。这个戏剧性事变，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同时成为多部长篇小说的题材。“戊戌变法”以血的事实，揭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命运，因此，引起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和探讨的热情决非偶然。正是这样一种历史精神，贯通了如此众多的不相连属的人物故事，使之成为现存世界的组成部分。

在二十世纪，具有重大开发和利用价值的历史事件，大约当首推五四新文化运动了。

其实，说是“事件”并不十分确切。这是一个短时段，惟凭一群知识者的努力，累积了巨大的精神能源。在中国，从颀硕的官僚到中学生，从愚鲁的武人到遍身油污的工人，很少有人不知道“五四”这名目，可是对它的意义，则普遍缺乏了解的兴趣。他们也许会从因循的教科书或报刊那里得知游行示威的情节，把汹涌的人潮和赵家楼的火光，当做狂欢节的象征。实际上，这是新文化启蒙运动濒临结束的信号，甚至无妨视做一场提前举行的悲壮的葬礼。他们不知道，未曾经过充分的理性启蒙的革命，潜伏着怎样的危机；不知道现代知识分子出师未捷而中途败绩，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他们不知道，目下匮乏的，正是当年的运动所竭力争取的；不知道八十年来，几代人的命运竟会如此交叠扭结在一起！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知识分子的“创世纪”。可是，他们全面背叛民族文化传统的英雄主义行为，并没有得以赓续；新的价值观念体系未及形成，就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这种悲剧性的结局，甚至整个的过程结构，包括它的意义所在，长期蒙受障蔽。比如，作为运动主体的是知识分子的自由集合

体，自组织，自生长；在政治家的眼中，则明确地被置于党派领导之下。生气勃勃的思想革命，完全成了政治—经济的被动的反映，成了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其实，无论是国民党人或是前共产主义者，当时都不可能左右这一运动，相反只能服从运动自身的独立指向。而这，正是现代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骄傲。起源于中国民族文化深部的危机，新文化运动就其性质而言，是一次启蒙运动，是反对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叛逆性行动，而不是单纯的反帝爱国运动。把它看做爱国主义运动，只符合后期政治性转向的表征，而无视于运动的全过程，完全抽掉了其中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内容，抹杀了世界主义也即“现代性”这一根本特性，把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集体主义、权威主义推到神圣的地位。启蒙运动的对象是广大国民，主要是劳工大众，结果启蒙主义者、知识分子反成了革命改造的对象。当年的知识者高叫“到民间去”的口号，满怀热忱，到处播撒盗来的火种；到了后来，却带着洗刷不清的“原罪”，“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作为一个具有自己的生产方式和职业特点的独立的阶级，被人为地削减为“阶层”，作为“毛”而依附在被指定的“皮”上面。由于启蒙的先驱者们立足于社会的改造，不曾为权力者准备种种治国平天下的方案，因此表面看起来，好像他们都是一群梦想家，并不存在确定的斗争目标。其实，他们把所有的一切都写到旗帜上去了，那就是：民主，科学，自由，人权。他们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一个没有压迫和奴役的国度，真正的人的国度，并且为此奔走呼号；然而不出几年，竟意想不到地陷身于一个“一党专政”、专制独裁的黑暗王国里了。

关于“五四”，长期以来存在着两个阐释系统：一个是政治的，或者称做政治家的；一个是文化的，也可称做知识分子的自我阐释。在前一个系统里，“五四”知识分子的作用，明显地被缩小为“先锋”作用，而不是主体的作用；由此出发，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变革进程中所应担负，而实际上也完全有能力担负的启蒙—批判—文化建设的角色，就给否定掉了。至于后一个系统，知识分子往往过于自轻自贱；及至九十年代，有少数以权威自居的学者，相率发起对“五四”的启蒙性和战斗性的攻击。至此，两个系统便合而为一了。

“五四”表面上轰轰烈烈，纪念起来好像也颇热热闹闹，事实上运动早已完结。说它完结，并非因为时过境迁，也并非因为政治势力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入侵，而在于知识分子或者被逼，或者主动地放弃了自身的权利和责任。

历史的复活，有待精神的觉醒。这精神，不属于“历史客体”，它植根于当代人的每一个个体中间，且为他们的生存状态所决定。不同时代的人们，如果都为同一种精神所唤醒，所激发，给历史划界将会变得多余，当代舞台会因此而获得大幅度的扩展，人类谋求自由民主与科学的斗争，前前后后也就有了热烈而深长的呼应。

“五四”：知识分子的自治运动

二十世纪是一个伟大的起始。

其实，早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就已经艰难地挪动它的脚步了。改革是被迫进行的。清政府官员在“内乱”面前，犹能做“中华大帝国”的酣梦，直到洋炮的轰鸣从南方海岸传来，震撼了宫廷的座椅，这才决心“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先是做军火买卖，接着开矿山，修铁路，废科举，兴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以及官员出洋考察等等。马克思描述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

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解体一样。”解体太缓慢了。这种速度，不但不能满足少数先觉者的期待，而且实际上，也不可能使中国免受挨打的耻辱与覆亡的危险，这样，政治体制的改革便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然而，最高统治者对于死亡异常敏感。在大独裁者、长期垂帘听政的慈禧看来，政改如同玩火，其结局只能加速以其个人为中心的权势集团的崩溃，于是及时地把光绪帝及其政改计划给扼杀了。“百日维新”的悲剧，堵死了和平改革的道路。所有曾经为改革的浪潮所感召的人们，开始强烈地意识到：依靠目前的政府，是不可能把改革有效地进行下去的。正是这个专制腐败的政府，成了外国强权利益的保护者，成了民族独立、自由和进步的死敌。这时，法国大革命的电火，穿过时空的密云迅速来到东方，在日本东京的留学生群中开始酝酿暴风雨。

革命势在必行。武昌城头枪声乍起，全国随之易帜。一个为转战数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军所无法推翻的政府，顷刻之间，居然结束在一场纸扎般的战斗里。胜利的欢乐十分短暂。革命党人开始蜕变，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依然为旧势力所把持，然而一律换了“革命”的招牌。袁世凯称帝是其间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件，虽然不成功，却使温和的共和主义实验严重受挫。革命党领袖孙中山不得不再度组党，而专制军人，则利用袁世凯死后的权力真空，极力发展私人势力，以致争城夺池，战乱频仍。人们在绝望中发现：革命前，他们是奴隶，革命后一样是奴隶；所谓革命，不过是一个幻象而已。

几千年的封建帝国，犹如一头巨兽，头被砍断了，庞大

的躯体不但不见腐烂，而且依旧完好无损地活着，这是极其可怕的。事实证明，肤浅的政治改革无济于事，必须有一个普遍深入的思想文化运动，启发国民的“最后的觉悟”，以促进社会的根本性改造。这个启蒙教育的使命，历史地落在中国近代第一代知识分子的身上。

“知识分子”一词，于二十年代末才开始在“五四”的继承者中使用。在整个新文化运动期间，启蒙的先驱者都不曾找到合适的名词为自己命名。五四则为其开出了一张“明确的出生证”。就像这新式名词一样，这批人物，获得了为中国传统士人所不具备的新型品格。他们大抵出身于绅士阶级家庭，有着相当一致的经历：进私塾，也入学堂，然后出洋留学；既熟读经书，也通晓西学，这样完整的知识结构，在国外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也是罕有的。所以，他们才会变得那般的胸怀博大，视野开阔，气质不凡。与此同时，东西方文化的异质性，又带给他们以内在的分裂性质；随着斗争的展开，易于趋向对传统的偏离和决裂。作为西方观念的传输者，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清末民初的一代，确也显得非常大胆开放；但正如美国学者许华茨所说，他们“就其个人文化而言，都是颇为惬意地深居于传统文化之中”。

科举制度的废除，切断了知识者与权力社会的联系，甚至使他们失去了身份的依据。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自由职业者。这种不再需要官方认同和缺乏物质保障的生存状态，加强了他们与社会的亲和力。这时，众多教育机构——其中主要是大学——为他们提供了新的生活空间，新的同一性；报纸杂志蜂起，据胡适保守的说法，1919年就涌现了四百种报刊，出版业随之有了很大的发展。教授、学者、编辑、记